

长江经济带与“一路一带”叠加效应下旅游经济转型升级路径¹

郑国中

【摘要】：文章结合旅游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以南京为例，分析了长江经济带与“一路一带”叠加效应下，城市旅游产业发展的转型路径。文章认为，基于国家战略的叠加效应和旅游产业分析的时间序列数据，可以对城市旅游产业发展影响因素、发展模式和经济效应进行系统、综合研究，将有助于拓展城市旅游产业研究范围与内容，对城市旅游产业研究有较大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一路一带”；叠加效应；旅游经济；转型升级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5）06-0096-05

一、长江经济带与“一路一带”叠加效应下旅游产业发展的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

（一）叠加效应下旅游产业发展的评价方法

长江经济带与“一路一带”叠加效应下，南京旅游产业发展的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的选择上，同样考虑到上述的诸多因素，以南京市旅游产业的基本发展的影响因素作为切入点，结合旅游产业的基本规律，对于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建构起南京市旅游产业分析框架。继而本文基于旅游产业GIU 框架评价旅游产业影响因素的量化指标。在数据来源层面，本文以官方统计指标为准，基本保证了从官方统计数据中直接获取的一手材料，对于没有直接体现出影响因素的指标予以相应的转换或者替代，以保证数据指标选取与处理方法的一致性和可比性。主要考察了《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03-2013)、《中国城市年鉴》(2003-2013)。^[1]在具体的建构过程中，考虑到城市旅游产业本身的动态与复杂性，本文在基本指标体系的建构、具体测量与评价中，遵循了坚持科学与可操作性、样本全面与可代表性、层次性与系统性的基本原则。本文基于系统的观点将旅游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细分为三个层面，也即政策方面、产业方面和城市旅游环境方面。这三个方面构成了彼此之间相互联系、共同促进的关系，制约并影响了城市旅游产业发展的水平和层次。

（二）叠加效应下旅游产业发展的指标体系

第一，政策层面的指标选取。本文选取的是长江经济带与“一路一带”叠加效应对于南京为代表的东部旅游城市的旅游发展的路径提升影响，由此，政策层面是首要考虑的因素。实际上，政府政策主要包括旅游产业政策、区域合作、投资政策及环保政策，涉及城市管理、政策制定等实施。这些指标较多地是定性的指标体系，然而，为了便于研究指标的可操作性，在具体的测算过程中将其转换为定量指标。具体来说，用旅游城市政府及主管部门颁布的政策数目与级别来衡量其产业政策实施，用旅游收入在地方GDP 占比衡量产业政策的绩效，用高校在校中相关专业学生数目衡量人才储备，用非公经济组织占比衡量市场经济自由度，用三次产业比重衡量政策对产业升级的支撑力度，用实际吸引外资衡量政策指引下的产业投资环境^[2]。

第二，产业层面的指标选取。长江经济带与“一路一带”尽管是基于国家发展战略的政策措施，然而，它的实施必然依靠

1. 收稿日期：2015-04-15

基金项目：2013 年江苏省级社科基金项目，“消费型聚集经济”视角下消费服务业促进江苏城市经济“双向”转型研究，项目编号是：13EYB014

作者简介：郑国中（1971-），副教授，研究方向：市场营销，服务经济、旅游管理。

产业的支撑，产业指标是我们考虑的第二个层面的因素。概言之，产业层面包括生产要素、产业规模、产业集群与产业结构等诸多影响因素。其中，生产要素涵盖了相关的旅游资源禀赋、资金、人力与技术资源。这些资源既包括了既有的资源，也涵盖了潜在的资源。后者指的是在旅游定位扩展基础上，借助城市的文化资源、艺术资源来开发的旅游资源。在具体的指标获取与分析中，本文对于南京市的A级到5A级级别的旅游景区进行了考察，用于反映旅游资源的丰富程度和品味。在具体的指标测算过程中，选取相应的艺术馆、图书馆的数量作为衡量艺术发展水平的指标，资金资源作为产业资产的指标。产业集群指标用于衡量旅游企业集中度，产业规模衡量旅游产业收入情况。

第三，城市发展环境的指标选取。城市发展环境包括区位条件、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科技创新等层面的评价指标。具体来说，包括城市铁路、民航旅客周转指数，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财政占比等方面的基本情况，也包括三产在GDP上的占比，科技创新力度以及城市规模经济的比重和要素成本等方面的指标。

二、基于南京为例的叠加效应下城市旅游产业发展模式

(一) 南京旅游产业的分层评价

对南京旅游产业分层的评价与分析，实际上是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南京旅游业发展的样本评价，旨在提取公共因子成分以便揭示出叠加效应下的各个因素之间相互关联的动态特称，进而判别其基本的发展模式，对于其发展路径与特征做出相应的总结，进而为后续的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效益提升提供研究的基础。

第一，基于南京市政府层面的政策因子分析。通过SPSS软件关于南京市旅游产业发展政府政策层面原始数据的因子分析发现，其KMO指标为0.741，符合因子分析的基本要求。基于此，抽取公共样本因子中的各个变量，通过指标分化的方式，得出其共同度，用于衡量公共样本的重要度。结果显示的提取后公因子方差指数则表征了原始数据中被提取的样本和信息数量。换言之，从效度的角度来说，如“政府旅游产业政策级别与数目指标”的方差为0.931，也就意味着与政策级别的指标中有百分之九十三的信息被有效提取出来，符合基本的效度指标要求（如表1）。从信度的角度来说，通过总方差解释可以看出，其基本的公共因子贡献率第一成分特征为3.874，较好地阐明原始数据，在信度上是符合标准的（如表2）。

表1 变量共同度指标体系

指标	变量	初始公因子方差	提取后公因子方差
政府旅游产业政策级别与数目指标	X1	1	0.931
城市旅游收入占城市GDP比重	X2	1	0.84
高等学校在校生数	X3	1	0.9
非公有制经济比重	X4	1	0.954
第三、第二产业产值比	X5	1	0.972
实际吸引外资额	X6	1	0.938
人均绿地面积	X7	1	0.897

表2 总方差解释

Component	Initial Eigenvalues			Extraction Sums of Squared Loadings			Rotation Sums of Squared Loadings		
	Total	% of Variance	Cumulative %	Total	% of Variance	Cumulative %	Total	% of Variance	Cumulative %
1	5.382	76.881	76.881	5.382	76.881	76.881	3.874	55.342	55.342
2	1.051	15.009	91.889	1.051	15.009	91.889	2.558	36.547	91.889
3	0.254	3.628	95.517						
4	0.176	2.512	98.029						
5	0.091	1.303	99.332						
6	0.037	0.53	99.862						
7	0.01	0.138	100						

根据主要成分的特征根系统指标和相关的累积方差的贡献率（表 3）可以得知，南京市在政策决策方面的载荷矩阵成分与公共因子的相关度在两倍以上，其所包含的正确的信息指数相对较高，信息量较大，较好地阐释了因子的相关度。尤其是，从旋转后的相关矩阵指数可知，政府产业政策级别的指数（X1）、二三产业产值比重（X6）等指标的载荷较大，占到相关比重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可以看出，南京市政府在政策等政府相关的领域，尤其是与一路一带等相关的领域进行的产业支持力度较大，而且对于旅游相关的产业重视程度较高，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较多的环境和投资等制度、政策方面的支持。[3]由是，将其定义为公因子 F1。与此同时，高校学生数量（X3）与非公经济占比（X4）等指标的载荷加大，将其称之为公因子 F2。这一指标的变化显示出的是政府对于旅游产业发展领域的投入，在高校及人才培养，高端人才储备等方面都提供了较好的支撑。非公经济占比的指标则体现了南京市政府有效地调节市场资源配置、激活旅游资本、完善旅游主体、提升旅游绩效方面较为灵活的政策措施和产业保障手段[4]。基于上述分析，进一步将两个公因子 F1, F2 明确为南京市政府在政策层面采取的措施中的促进政策和保障政策两个方面（见表 4）。

表3 F1\F2特征根及累积方差的贡献率

主成分	旋转前			旋转后		
	特征根	方差贡献率	累计方差贡献率	特征根	方差贡献率	累计方差贡献率
F1	5.382	76.881	76.881	3.874	55.342	55.342
F2	1.051	15.009	91.889	2.568	36.547	91.839

表4 公共因子得分矩阵

指标	变量	主成分	
		F1	F2
政府旅游产业政策级别与数目指标	X1	0.071	0.204
城市旅游收入占城市 GDP 比重	X2	-0.339	0.202
高等学校在校生数	X3	-0.06	0.361
非公有制经济比重	X4	-0.317	0.636
第三、第二产业产值比	X5	0.141	0.118
实际吸引外资额	X6	0.295	-0.111
人均绿地面积	X7	0.349	-0.206

进一步地，根据公共因子 F1\F2 得分矩阵进行相关分析，得出其标准的变量值和基本载荷的关系，同时以上述公共因子作为贡献率的权重，可以得出南京市旅游产业政策层面的因子得分 A1。（表 5）

表5 南京市产业政策A1得分

年份	A1	F1	F2
2001	-73.2908	-0.1280	-1.8115
2002	-87.5151	-0.8805	-1.0612
2003	-48.4608	-0.2784	-0.9045
2004	-49.3926	-0.6856	-0.2982
2005	-34.8910	-0.7134	0.1256
2006	-1.1486	-1.0222	1.5165
2007	11.9589	-0.7058	1.3960
2008	21.4448	0.1023	0.4318
2009	68.6919	1.2963	-0.0834
2010	72.8481	1.1053	0.3195
2011	119.7551	1.9200	0.3694

从南京市产业政策得分的基本情况来看，南京市2011年之前的数据显示其政策领域的得分大幅度提升，政策因子的比重明显增强。从实际的领域来看，南京政府及旅游主管部门对于城市旅游的投入不断加大，实施相关政策的效度和信度得到提升，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的相关制度保障也得到了全力的提升，显然，这对于当下“一路一带”战略的实施具有极强的政策扶持的基础。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旅游产业促进政策F1的贡献率较高，达到了百分之五十五，显然，近年来，尤其是2013-2014年

两年间，南京由于一系列国际国内重大赛事的举办和相关活动的支持，政府和旅游主管部门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产业政策，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城市旅游的发展。而当下的“长江经济带”的提出和“一路一带”战略的叠加必将建基于以上的政策发力的基本路向，带动相关产业上下游的发展，这从经济规律发展的层面来说是毋庸置疑的。与此同时，旅游产业保障政策F2的贡献率达到了百分之三十三。这又在另一个层面强调了政府在灵活地处置市场资源配置、调动资本市场多元化、提升市场经营效率领域发挥了市场的机制作用和政府调节作用的有效组合，促进了南京旅游产业的良性互动。

第二，基于南京市产业发展层面的因子分析。同样地，通过 SPSS 软件关于南京市旅游产业层面原始数据的因子分析发现，其 KMO 指标为 0.720,也是符合因子分析的基本要求。抽取公共样本因子中的各个变量，通过指标分化的方式，得出其共同度，用于衡量公共样本的重要度。结果显示的提取后公因子方差指数则表征了原始数据中被提取的样本和信息数量。换言之，从效度的角度来说，如“旅游核心产业固定资产”的方差为 0.902,意味着与产业级别的指标中有百分之九十的信息被有效提取出来，符合基本的效度指标要求（如表 6）从信度的角度来说，通过总方差解释可以看出，其基本的公共因子贡献率第一成分特征为 4.808，较好地阐明原始数据，在信度上是符合标准的。

表6 南京市旅游产业层面的变量共同度

指标	变量	初始公因子方差	提取后公因子方差
旅游资源禀赋	X8	1	0.963
艺术馆数、文化馆数、公共图书馆数	X9	1	0.847
旅游核心产业从业人员数	X10	1	0.921
旅游核心产业固定资产	X11	1	0.902
旅游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	X12	1	0.949
城市旅游总收入	X13	1	0.915
旅游核心产业旅游企业集中度	X14	1	0.967
旅游核心产业营业收入占城市旅游总收入比重	X15	1	0.516

根据主要成分的特征根系统指标和相关的累积方差的贡献率得知，南京市在产业方面的载荷矩阵成分与公共因子的相关度较高。尤其是，从旋转后的相关矩阵指数可知，旅游资源禀赋（X8）、艺术馆图书馆数量比重（X9）等指标的载荷较大，占到相关比重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可以看出南京市政府在产业经营相关的领域支持力度较大，而且对于旅游相关的产业重视程度较高，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较多的环境和投资等制度、政策方面的支持。与此同时，核心产业从业人员数量（X10）与旅游企业集中占比（X14）等指标的载荷加大。这一指标的变化显示出的是旅游产业发展领域提供了较好的支撑。旅游产业市场资源配置、旅游资本提升方面较为灵活。南京市旅游产业发展的基本情况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自2011年开始，南京市旅游产业的发展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具体来说，产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是旅游产业的基本投入和产出的效益比进一步优化，核心旅游产业的发展贡献比值较为稳定。这说明，南京市的旅游产业的发展仍然是以核心的旅游产业作为主导的，投入产出效应的比值趋于合理与优化。值得注意的是，旅游企业的员工生产效率的基本负荷较大，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市场经济和快节奏的生活下，旅游产业从业者之间无论是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有所增加，工作的效率和相应的收益产出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倘若站在长江经济带和一路一带的发展的长远视野来说，核心产业的集聚和叠加对于南京旅游产业的发展 and 分化必将产生重要的影响，旅游产业的集群化与产业化的趋势日益凸显。由此，我们根据公共因子F1\F2得分矩阵进行相关分析，得出其标准的变量值和基本载荷的关系，同时以上述公共因子作为贡献率的权重，可以得出南京市旅游产业层面的因子得分A2。

（二）城市旅游产业发展模式的识别

基于南京城市旅游发展的GIU 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的基本方法得出南京市旅游产业发展的政策因子得分（A1）产业发展因子（A2）和城市环境发展因子（A3）。从三个层面上的因子得分情况可以看出，三个层面的得分情况与南京旅游产业发展的关联程度。在三个层面的得分可知，A2 因子最大，A1 次之，A3 最后。因此，可以认定以南京为代表的东部城市旅游产业发展的基本模式之一：产业驱动、政策支持型的旅游模式。

南京产业驱动、政策支持型的旅游发展模式中公经济的比重负荷较高，旅游产业发展中保障作用的首要因素是市场经济制度，其次是人才制度。尤其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旅游产业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有利于南京在未来的一路一带体系中营造更为良好的经济环境。在上述环境的营造的同时，南京市政府之前采取的一些了促进旅游产业市场化的相关制度，为南京旅游产业市场经济框架体系的稳定扫除了基本的准入障碍，促进了多元体制共同发展，产业素质和发展的基本效益不断提升。这对于当前的南京长江经济带体系发展的优势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打破了经济体制障碍和条块性质的分割，更多的因素进入市场，流动与自由组合更为灵活多样，产出效应得到体现。二是市场供需关系发生变化，旅游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与旅游需求结构基本一致，旅游要素之间的市场关联趋于多元。尤其是，旅游市场主体呈现多元化的局面，各类资本充分调动起来。三是南京旅游产业的市场竞争形势的放开，市场经济制度的健全，拓展了各种新兴旅游业态的发展，带动了城市商业、文化、科教等产业发展，提升了南京的产业发展内涵。四是南京市政府对于旅游产业的发展所采取的保障政策也在旅游发展中起到了保障作用，制定了相关经济、投资与产业政策，通过人才培养、生态保护促进了产业升级和素质的提升，真正完善了上述模式的基本路径。

（三）城市旅游经济效应与升级方式

通过上述旅游产业发展的基本模式的探究和分析，结合南京样本现实发展状况可以得出其基本的经济发展的效益模型。基本前提是对于南京城市旅游发展的三个假设。第一，南京城市旅游产业的发展在南京经济发展中是促进作用。第二，南京旅游部门产出的增长极大地带动了非旅游部门产出的增长。第三，旅游产业的发展促进了相关的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基于上述三个假设，考察南京市旅游产业发展同经济增长的经验数据，结果显示，其旅游收入与GDP的数据序列呈相似的基本走势，二者关联度极高。实际上，目前国内外关于旅游收入与GDP的数据序列的实证研究已经较为成熟，本文采用了基本的数据增长的研究方法，通过回归模型的测算认为，南京的城市旅游经济增长与当地的GDP增长之间存在着单向的因果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正向拉动效应。换句话说，上述假设的1, 2, 3点均成立的前提下，城市旅游部门的边际生产力较高，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效率较高，旅游中融入了较高的非劳动力要素，不断提升了相关的产业附加值，旅游产业集聚化增长的态势相对明确。然而，对于南京的城市旅游发展而言，并不是所有的要素都存在齐头并进的局面。相反的，南京核心旅游产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并推进了整个旅游产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旅游配套设施的完善，第三产业得到优化，通过其产业链条的波及效应产生的直接以及间接的产业发展，不断调整着城市产业结构模式。在这种产业模式发展效应的带动和完善下，南京市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升级与换代，城市产业结构向着第三产业、第二产业、第一产业的基本路向实现优化。

三、南京城市旅游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第一，借力国家战略，优化旅游产业政策结构。区域一体化与区域旅游竞合是提升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基于上述的分析，我们认为，南京地区城市旅游产业发展要在国家战略引导下，不断借助相关的产业竞合，培育新的旅游增长点，挖掘文化特色的潜力，采取潜能升级的方式实现旅游产品的错位互补发展态势。

第二，强化产业集群，构建旅游新兴旅游链条。产业集群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环节和极大的推动力量。南京地区的产业集群发展能够将既有的旅游资源比较优势进一步转换为竞争优势，为此要不断强化国家级核心景区的集群结构，提升围绕核心而形成的带状集群结构模式。同时，要发展多种形式的旅游地区，构建商务旅游、遗址类旅游、自然资源旅游等多种产业形式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第三，优化旅游环境，提升旅游产品结构。鉴于旅游产品与旅游城市环境之间的空间结构、行业结构、消费结构等方面的重要关系，南京地区旅游环境建构要与旅游产业升级同步进行，通过科技创新提升旅游产品的产品结构，提高旅游城市的科技含量和信息化水平，借助产业竞合、知识溢出，加强对于主题旅游的建设，增强旅游城市吸引力、体验感，让游客能够感同身受，促进旅游产品结构的整体提升。

[参考文献]

- [1] 李锋, 陈太政, 辛欣. 旅游产业融合与旅游产业结构演化关系研究——以西安旅游产业为例[J]. 旅游学刊, 2013, (01).
- [2] 把多勋, 郭言歌, 高力. 基于产业集群效应的区域旅游竞争力分析[J]. 商业时代, 2012, (34).
- [3] 田纪鹏. 国际大都市旅游产业结构多目标优化模型构建与实证研究——基于优化上海旅游产业结构的视角[J]. 上海经济研究, 2012, (11).
- [4] 赵磊. 旅游发展与中国经济增长效率——基于 Malmquist 指数和系统 GMM 的实证分析[J]. 旅游学刊, 2012, (11).

[责任编辑: 唐鑫]